

当代中国廉政话语建设研究

——以十八大以来《人民日报》头版廉政报道为例

于 琴

提 要: 本文以十八大以来《人民日报》头版廉政报道为分析语料,综合运用语料库语言学、话语分析等研究方法,从社会学、人类学、社会语言学等多学科交叉研究的视角对当代中国廉政话语建设进行了分析研究。本文将当代中国廉政话语建设操作化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这一由表及里的治理逻辑,论证了廉政话语内涵的表层结构由与廉政语义直接相关、近相关的词汇聚合扩展到与之远相关的隐喻性词汇聚合的过程,揭示出廉政话语的深层结构由结构观下二元对立的主客体关系走向建构观下官方话语与大众话语互文共现的主体间性关系的历史趋势。

关键词: 话语 廉政建设 廉政话语 国家治理

一、问题提出与研究设计

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为核心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条主线,围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目标,确立了“四个全面”(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布局,进一步完善了我党治国理政的科学思想体系,其中“全面从严治党”被摆在了突出位置。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强调“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反腐败和党风廉政建设是全面从严治党的有力抓手。

(一) 问题提出

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和勇于

担当的精神，不断推进反腐败和党风廉政建设，取得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衷心拥护。党中央立足中国国情：一是力图治本先治标，治标为治本赢得时间，以“苍蝇老虎一起打”的气势，形成了“不敢腐”的新态势；二是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劲头，扎好反腐的铁篱笆，从全面从严治党、依法治国的角度，形成了“不能腐”的制度约束；三是以“不忘初心”的历史使命感，号召全党同志砥砺前行，树立起“不想腐”的自觉信念。廉政话语是国家在反腐败斗争实践中逐步构建起来的话语体系，在反腐败工作日益制度化、规范化、常态化的今天，我国的廉政话语也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

《人民日报》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机关报，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定为世界十大主要报刊之一，对社会舆论具有极强的引导作用，是国家视角与国家话语的最权威体现（钱力成，2010）。《人民日报》于1946年5月15日在河北邯郸创刊，当时为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机关报。1948年6月15日，《人民日报》与《晋察冀日报》在河北平山合并，成为中共中央华北局机关报，代中共中央机关报。1949年3月15日迁至北平出版，同年8月1日正式成为中共中央机关报，直至今日。《人民日报》从创刊至今，始终紧紧围绕着党中央的思想路线开展宣传工作，从排版布局到稿件选择，从内容及其长度、深度到词语运用等，都经过精心组织和安排，并遵循严格的审查程序（黄帅，2011）。《人民日报》对反腐倡廉建设等治国治党要务的宣传报道，向来态度鲜明、目的明确。因此，本文选择《人民日报》刊载的反腐倡廉建设方面的相关内容作为研究语料，旨在以此为切入点分析十八大以来我国廉政话语的构建机制。本文围绕“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法制机制以及“不想腐”的信念教育机制，对《人民日报》中的相关语料进行词频统计，并结合时事背景系统地探讨国家廉政话语体系的构建路径。

（二）研究设计

通过统计研究与主题相关的主题词词频已经成为社会学、语言学等诸多学科分析话语文本的有效方式。本文利用人民日报图文数据库，首先对2012年11月8日—2015年12月31日所有发表于《人民日报》的文章进行标题检索关键词“廉政”，并筛选头版新闻文章作为研究对象，建成廉政话语专用语料库。然后结合十八大以来反腐败斗争战略部署，把专用语料库分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三个子语料库，通过使用国家语委分词语料库（Corpus Word Parser）对廉政话

语专用语料库进行分词处理后,运用 ROST Content Mining 对专用语料库进行词频统计。本文从“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这三个子语料库中分别选取出现频率排在前十位的高频词列为一组,以此为切入点逐一对这三组高频词所属的子语料库进行分析,再结合高频词所属文章的社会语境及发表的时事背景,综合运用话语分析的方法对统计数据进行分析,以探析国家廉政话语体系的构建路径。

二、话语分析视阈下的廉政话语

中国特色廉政话语体系是中国共产党历届领导集体在不断探索和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构建而成的,从改革开放以前脱胎于运动式反腐历史语境中的阶级话语,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发端于法制式反腐历史语境中的教育话语,再到十八大以来诞生于深化法制式反腐历史语境中的更具人性化的公众话语,体现了我国民主和法治的进步,顺应了时代发展的要求,政府用一系列的语言策略把“廉政”、“腐败”、“反腐败”等高度抽象的政治概念与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经验相结合,赢得了党心、军心、民心。

(一) 话语与话语分析

“话语”这一概念在不同学科的研究视角和立场下呈现出差异性。语言学中的“话语”大多用来指区别于书写“文本”的口头对话的延伸部分(费尔克拉夫,2003),是区别于某一社会群体约定俗成、高度结构化的语言系统的衍生品,在这个意义上,“话语”与“言语”颇为相似。现代语言学之父索绪尔区分了“语言”和“言语”两个概念,认为语言学的研究对象是潜藏于某一社会集团全体成员之中的,社会性的,并独立于个人的语言系统;“言语”则是个体运用结构系统的语言在交际中说的话,是个体行为。语言学的研究对象是具有结构性的“语言”,“言语”则是直到20世纪60年代随着社会语言学的兴起才逐渐被纳入语言学研究的视角。社会语言学派认为语言使用中的变化是系统的,“言语”或“话语”也是经得起科学研究的(费尔克拉夫,2003),他们推崇将“话语”置于具体的社会语境中加以分析研究。

社会学视角下的“话语”概念与“语言”和“言语”有所不同,它把“话语”

当作社会实践的一种形式，而不是一个纯粹的个体行为或情景变量的一个折射（费尔克拉夫，2003）。20世纪60年代法国后结构主义社会学代表米歇尔·福柯等人开始了语言学转向（刘少杰，1999）。米歇尔·福柯在当选法兰西学院院士后所作的就职演讲《话语的秩序》中提出“话语即权力”的概念，在这里“话语”不再是一个单纯的语言学概念，而是一个多元综合的关于意识形态再生产方式的实践概念（陶徽希，2009）。福柯提出的“话语”的概念不同于索绪尔结构主义视角下的“语言”和“言语”，他不再把话语看作“纸上苍生”，而是看成对社会实践主体具有支配性和役使性的社会力量，这种力量独立于社会集体和个人，又与之密切相关。福柯所说的“话语”具有建构社会现实的功能，而不仅仅是结构观视野下简单的二元对立。话语的建构观，是将话语看作从各个方面积极地建造或构筑社会的过程，即话语建构知识客体、社会主体和自我“形式”，建构社会关系和概念框架（费尔克拉夫，2003）。

话语分析将语言的文本分析与话语的“社会方向”紧密结合起来，广泛应用于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语言学等学科。“话语分析”这一术语是由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家哈里斯在《话语分析》（*Discourse Analysis*）一文中首先提出的，该论文发表于1952年美国《语言》（*Language*）杂志第28卷，以此为标志，话语分析逐渐进入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视野（刘旭凤，2014）。英国语言学家费尔克拉夫将话语分析操作化为三个实践向度：关注文本语言分析的文本向度、阐释文本生产过程和解释过程性质的话语实践向度、阐释社会分析方面问题的社会实践向度，其话语分析框架注重话语文本和社会背景的深度结合。本文以费尔克拉夫的三向度话语分析法为框架，从文本生产、互文性消费以及社会实践三个向度探析我国当代廉政话语的构建路径。

（二）廉政话语与国家话语

廉政话语是国家话语中的一种。国家话语就是以国家作为言说的主体，呈现国家视角，表达国家立场，进而建构社会现实。国家话语具有强大的建构能力，并能够通过一定的方式获得话语对象的接受。以我国为例，国家话语代表着执政党的意志，表达执政党的政治意识形态和利益诉求，配合执政党进行相应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活动（袁迎春，2015）。人们日常交际的口语及生活用语，往往一经出口便如石子落入沧海，对公共社会生活几乎不会产生任何影响。而代表着社会主流叙事

的国家话语，其话语文本背后的意识形态以及权力秩序则会被不断强化，形成合法的、对社会生活有影响的权威话语。国家话语作为权威话语，对政府行政管理和国家社会治理具有支配性力量，它以话语的形式管约着社会实践主体，构建着社会事实。从新中国的政治伦理与实践来看，廉政话语是国家话语的有机组成部分，而执政党中央机关报的社评、报道等作为政府机构话语，具有独特的体裁特征，是政府运用话语策略构建执政权力的政治技术。

廉政话语是中国共产党自建党以来，在党风廉政建设的社会实践中形成的话语体系。中国共产党自建党以来就十分重视反腐和党风廉政建设，如1942年的延安整风运动，就带有反腐败的性质。新中国成立初期，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为了巩固新生的无产阶级政权，针对党内出现的社会影响恶劣的贪污腐化现象，开展了几次声势浩大的反腐败运动，如“三反”、“四清”运动。这一时期阶级斗争和敌我矛盾被摆在了突出位置，主要依靠发动人民群众开展反腐败运动来推进反腐倡廉建设，国家的廉政话语体系主要是由阶级话语建构。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果断做出了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要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科学决策。党中央针对这一时期经济建设中出现的贪污腐化现象，采取了一系列的反腐败举措，初步建立健全了相关的法律法规。邓小平同志在反省改革开放初期腐败之风有所抬头的严峻形势时，认为这是教育没有跟上，思想政治工作薄弱所致。因此，党中央在严厉惩治腐败分子的同时，将惩治与教育有机结合起来，从教育入手，增强党员干部的党性，增强其法律意识，使其树立法制观念，在全社会培育懂法、守法和自觉维护法律权威的氛围，以达到遏制腐败之风蔓延的目的。在这一时期，党的反腐倡廉工作逐步由运动式反腐转变为法制式反腐，反腐措施主要是将教育与惩治相结合，这个时期的国家廉政话语体系主要由教育话语来构建。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更加重视反腐倡廉建设，反腐败力度空前加大，有力地震慑了无视党纪国法，疯狂攫取不当利益，给党和国家造成重大损失的腐败分子，反腐败和党风廉政建设从此进入新常态。这一时期党中央反腐败工作的新思路主要表现为，在法制式反腐的基础上着力构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反腐长效机制。党中央在实践中强调，要更多地依靠制度和法律建设推进反腐倡廉建设，更好地完善全方位反腐倡廉体系。在反腐新常态的时代背景下的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中，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更是以平实、朴实、

真实的“平言平语”构建起中国特色廉政话语，这些话语的构建路径与反腐理念集中反映着党的新一届领导集体的治国理政思想境界。

三、廉政话语的文本生产

词汇重复和模式化是政治家表明其关注点及由此产生的话语模式的一种最具系统性的方式 (Flowerdew, 2004)。词汇是语言的重要组成部分，话语的生产，即对话语秩序的构建过程，词汇选择是表明政治态度的风向标和晴雨表，它帮助使用者表达思想并构筑话语理念 (优泽顺、陈建平, 2009)。党的十八大以来，反腐败工作成效显著，反映反腐败斗争及廉政工作的文本构建从词汇选择上看，颇具时代气息，表明党中央正着力构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反腐长效机制。《人民日报》中关于廉政报道的文章通过对一系列与廉政语义相关的高频词汇生产出反腐新常态时期中国特色廉政话语。

(一) 不敢腐——廉政“惩治话语”

习近平同志指出，要坚持“苍蝇”、“老虎”一起打，坚持有腐必反、有贪必肃，下最大气力解决腐败问题，努力营造风清气正的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不断以反腐倡廉的新成效取信于民 (习近平, 2014a)。“不敢腐”子语料库词频统计结果显示，反腐倡廉建设的“惩治话语”中出现频次最高的廉政语义相关词汇依次为“腐败”(184次)、“干部”(65次)、“惩治”(51次)、“坚决”(44次)、“纪委”(41次)、“必须”(41次)、“权力”(40次)、“坚持”(36次)、“零容忍”(36次)、“群众”(29次)。其中“腐败”、“惩治”、“干部”在“不敢腐”子语料库中出现频次分列前三，与惩治腐败同步展开的“打虎拍蝇”行动对全国大大小小的“干部”形成上下联动的反腐高压态势，这无疑对干部们起到了敲山震虎的警戒作用，使干部们紧紧围绕“权力”的监督和制约开展工作，纪委干部更要不辱使命，履行好监督执纪的职责。从以上廉政话语的政治态度上可以看出，党风廉政建设和惩治腐败是一项长期、复杂而艰巨的任务，必须持之以恒、常抓不懈。在《人民日报》的相关语篇中，党中央惩治腐败的政治态度集中体现在高频出现的“坚决”、“坚持”、“必须”等词汇上，这些国家廉政话语体现了党中央惩治腐败的坚定决心，

以及对腐败现象“零容忍”的态度。反腐败是从从严治党的重要手段，也是赢得民心的重要抓手，腐败得不到惩治就会丧失人民群众的信任。反腐倡廉建设关乎人心向背和党的生死存亡，惩治腐败，就是要从人民群众身边的小事抓起，并常抓不懈，形成常态化的长效机制，这样才能赢得民心。

（二）不能腐——廉政“制度话语”

反腐倡廉建设要从源头抓起，在惩治“苍蝇”、“老虎”的基础上需要深化反腐体制机制改革和创新，扎起制度的“篱笆”，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习近平，2014a）。“不能腐”子语料库词频统计结果显示，反腐倡廉建设的“制度话语”中出现频次最高的廉政语义相关词汇依次为“制度”（149次）、“腐败”（88次）、“干部”（77次）、“权力”（71次）、“法规”（70次）、“领导”（65次）、“监督”（59次）、“反腐倡廉”（39次）、“廉政”（32次）、“体系”（31次）。在“不能腐”子语料库中，以《人民日报》为代表的党媒紧紧围绕着这些高频词构建反腐倡廉“制度话语”文本，其中“监督”机制是为了更好地“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这是“反腐倡廉”、构建“廉政”“体系”的有效手段。从查处的腐败案件看，权力不论大小，只要不受制约和监督，都可能被滥用（习近平，2014b）。强化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让党员领导干部“不能腐”，必须从源头着手，从完善体制机制抓起，坚持深化改革和创新，着力构建一整套严格惩治和预防腐败的制度体系。要完善党内力运行和监督机制，实行权责对应，坚决反对特权，防止滥用职权（习近平，2014c）。打造“不能腐”的制度环境，从而有效降低腐败发生的概率。

（三）不想腐——廉政“信念话语”

思想纯洁是马克思主义政党保持纯洁性的根本，道德高尚是领导干部做到清正廉洁的基础（习近平，2013）。中国共产党历来都非常重视对党员干部的理想信念教育。“不想腐”子语料库词频统计结果显示，反腐倡廉建设的“信念话语”中出现频次最高的廉政语义相关词汇依次为“教育”（54次）、“廉政”（52次）、“干部”（43次）、“文化”（36次）、“领导”（22次）、“道德”（19次）、“廉洁”（17次）、“提醒”（14次）、“党员”（12次）、“谈心”（12次）。可以看出，反腐倡廉建设的“信念话语”主要通过表示“教育对象”、“教育内容”和“教育方式”的

高频词构建：“教育”、“廉政”在“不想腐”子语料库中出现频次最高，集中表现了“信念话语”的核心即“廉政教育”，其教育的对象由“党员”、“干部”、“领导”等高频词构建，教育内容则由“道德”、“廉洁”、“文化”等高频词构建。加强领导干部的道德修养和思想素质是党员的人生必修课，法律制度的完善是对党员干部外部的约束，道德约束则是党员干部自我约束的思想觉悟。反腐倡廉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性工程，需要多管齐下、综合施策，但从思想道德抓起具有基础性作用（习近平，2013）。要筑牢党员干部“不想腐”的思想根基，就必须加强对党员干部的理想信念教育（黄新根，2016）。“不想腐”子语料库由“提醒”和“谈心”等高频词构建，点明了对党员干部进行廉政教育的方式，面对一些党员干部在廉洁自律方面出现的问题，要即时谈话、即时提醒，督促党员干部提高自身“道德”修养，使其在行使职权的时候能自觉约束和规范自身行为，从而达到“廉洁”自律不想腐的效果。坚持理想信念，坚持共产党人精神追求，始终是共产党人安身立命的根本。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习近平，2012）。

四、廉政话语的消费实践

话语消费环节的互文性是指用来描述话语生产者在生成的文本中对此前已存在的文本的具体指涉，这些指涉会引导读者运用自己已拥有的对相关文本的具体知识来更好地理解文本（辛斌，2008）。消费环节的互文性，强调了话语受众带入解释过程的其他文本对解释的建构作用，帮助人们参照熟悉的活动与熟悉的风格和形式对新的话语作出理解（李亚昕，2013）。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采取了一系列高强度、高频率的反腐措施，赢得了社会民众的普遍认可，而中国共产党着力构建的“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廉政话语机制的互文实践功不可没。Wilson指出，隐喻有助于解释复杂的政治主张，唤醒听众的内心情感，从而实现特定的交际目的（Wilson，1990）。前文中所论述的高频词汇都是与“廉政”概念直接相关或近相关的词汇聚合，如“腐败”、“领导”、“干部”等，而围绕这些高频词汇具体产出的廉政话语文本的表述，却大量使用了与“廉政”概念远相关的词汇，如“老虎”、“苍蝇”、“笼子”等。这些远相关的词汇其聚合特征为隐喻性极强，扩大了“廉

政”概念的语义场半径，使廉政话语更贴近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从而更能引发话语受众的共鸣，实现官方话语向公众话语的转换。

（一）“不敢腐”话语秩序的构建

习近平同志指出，“全党同志要深刻认识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以猛药去疴、重典治乱的决心，以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勇气，坚决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人民日报》在构建“不敢腐”的“惩治话语”语篇中，往往把“腐败”与医学中的疾病相联系，惩治腐败就是要与腐败做斗争，与疾病做斗争，把反腐败与战争关联。例如“腐败现象是侵入党的健康肌体的毒瘤，坚持不懈反对腐败、坚定不移割除腐败毒瘤。”^①“我们要通过查处周永康严重违纪案件，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坚持零容忍的态度、猛药去疴的决心、刮骨疗毒的勇气、严厉惩处的尺度不变，凡腐必反、除恶务尽。”^②语篇中“斗争”、“毒瘤”、“猛药去疴”、“刮骨疗毒”等都是与疾病相关的医学话语，把党组织隐喻为人的肌体，无论“疴”有多重，都秉持着“治病救人”的态度，及时果断下“猛药”。这样通过隐喻，以群众熟知的疾病症状合理而巧妙地移情于腐败的本质，使得廉政话语与公众话语紧密结合。

（二）“不能腐”话语秩序的构建

“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如何靠制度更有效地防治腐败，仍然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习近平，2013）要让领导干部认识到“不能腐”，就必须从源头抓起，着力完善相关的体制机制法制。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依法办事，带头遵守法律，始终对宪法和法律保持敬畏之心，牢固确立法律红线不能触碰、法律底线不能逾越的观念，不要去行使依法不该由自己行使的权力，也不要去干预依法自己不能干预的事情，更不能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做到法律面前不为私心所扰、不为人情所困、不为关系所累、不为利益所惑（习近平，2014d）。《人民日报》在构建“不能腐”的“制度话语”语篇中，往往把制度隐喻为“笼子”、“金”、“铁”等具有坚固属性的工具或材料，“把权力关进

^① 人民日报，2014，《坚决惩治腐败，严肃党纪党规》，12月6日。

^② 同上。

制度的笼子”（王珏、江南，2014），把体制、机制、法制打造成反腐倡廉的“金规铁律”，让一切滥用权力的行为得到约束与监督。另外，《人民日报》的廉政宣传语篇还把反腐机制的制度约束力与战争话语相关联，把领导干部的违纪违法行为隐喻为踩“红线”、碰“高压线”、闯“雷区”；把与党纪国法相背离的灰色地带、双重标准隐喻为“暗门”、“天窗”、“破窗”等人民群众在生产生活中经常接触到的事物，例如：对破坏规矩的行为要严厉查处，不留“暗门”、不开“天窗”，坚决防止“破窗效应”。廉政建设要狠抓制度执行，扎牢制度篱笆，真正让铁规发力，让禁令生威（习近平，2014e）。

（三）“不想腐”话语秩序的构建

廉政建设的根基在于领导干部自律意识的提高，要提高领导干部遵纪守法的自觉性和拒腐防变的能力，必须加强理想信念教育，使其牢固“不想腐”的思想道德防线。思想教育是基础性工作，是构筑拒腐防变道德防线的根本途径，只有教育工作做好了，在思想上构筑起抵御腐败的坚固防线，才能使制度、监督、惩治等措施行之有效（黄传英，2015）。形象地说，理想信念就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没有理想信念，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习近平，2012）。《人民日报》在构建“不想腐”的“信念话语”语篇中强调廉政语义与表状态隐喻成分的关联性，把领导干部思想教育的状态隐喻为“永远在路上”，通过“提醒”、“谈心”的方式时刻提醒领导干部反腐倡廉是一项长期性的系统工程，要对自己理想信念的提高永远保持“不忘初心”、永远前进的态势。另外，《人民日报》的廉政宣传语篇还把与领导干部“提醒”、“谈心”的具体内容与社会大众的生活实践相联系，通过讲纪律、指问题、提要求，让“谈心”、“提醒”的对象对照党章党纪和法律法规“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王方杰、杨柳，2014）。我们党以马克思主义为立党之本，以实现共产主义为最高理想，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根本宗旨（习近平，2014e）。党中央构建的廉政话语也密切联系人民群众生活实践和社会实践，用人民听得懂、听得进去的话语来向人民汇报，与公众互动。

（四）廉政话语的社会实践

话语的社会实践，就是将话语置于意识形态和权力关系之中，结合社会语境，对话语秩序进行宏观分析。费尔克拉夫认为，社会语境不仅包括局部的交际环境，

还包括交际时所处的社会、文化、历史和政治环境，其中最重要的方面是权力关系以及维持它的意识形态（李亚昕，2013）。社会实践的话语分析主要是揭示话语秩序如何建构在内化的社会结构和社会习俗基础上，即分析如何使话语秩序合法化。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反腐力度空前加强，成效显著。随着反腐败斗争向纵深推进，党中央正着力构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体制机制。党的十八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提出要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增强宗旨意识，使领导干部“不想腐”；加强体制机制创新和制度建设，强化监督管理，严肃纪律，使领导干部“不能腐”；坚持有腐必惩、有贪必肃，使领导干部“不敢腐”。随着反腐败斗争的不断深入，“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反腐长效机制正在逐步形成，其内在逻辑是由“不敢腐”的治标层面入手，逐步形成“不想腐”的标本兼治的反腐机制。十八大以来，我们的国家廉政话语建设已不仅仅停留在反映、体现二元对立的“腐败”与“反腐败”式的主客体关系，以《人民日报》为代表的党媒通过词汇选择、隐喻等话语技术，将廉政话语内涵扩展到与廉政语义异质的、远相关的医学、军事等领域，并将其整合到反腐新常态时期的廉政话语结构当中，让当代中国的廉政话语更贴近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的实践经验。这些国家廉政话语的表层结构呈现出多元的词汇聚合，其深层内核折射出主体间性的治理理念。

五、小 结

本文以十八大以来（2012年11月8日—2015年12月31日）《人民日报》头版的廉政报道为分析语料，把当代廉政话语的构建路径操作化为话语生产、消费过程^①，通过对廉政话语专用语料库的分析，揭示出“廉政话语”内涵的表层结构不断扩展的过程。十八大以来，《人民日报》的反腐宣传语篇紧紧围绕着“廉政”、“腐败”、“反腐败”等与廉政语义直接相关的词汇，高频重复与之近相关的“干部”、“领导”、“权力”、“纪委”、“法规”等词汇来凸显国家廉政话语内涵。通过高频词汇构建出的话语文本中，“廉政话语”的语篇实践则使用了大量与“廉政”

^① 廉政话语的分配环节即廉政话语的传播路径，属于传播学、新闻学的研究范畴，不是本文研究的重点，故不赘述。

基础语义远相关的词汇，如“老虎”、“苍蝇”、“笼子”、“毒瘤”、“红线”、“高压线”等。在廉政话语文本生产过程中，“廉政”的语义场半径逐层扩大，通过囊括更多与廉政语义远相关的语义义项来丰富自身的语义内涵，这些语义义项大都源自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实践经验。

廉政话语秩序的重构是廉政话语构建的重要内容，廉政话语的消费过程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着力构建来源于人民、扎根于人民的廉政话语理念。廉政话语消费环节的互文实践主要是通过隐喻来唤起人民群众对官方话语的认同，人们通过移情思维，对当前反腐倡廉建设实践进行再概念化，结合自身的生活经验去理解抽象的廉政概念与复杂的政治形势。随着时代的变迁，廉政话语由运动式反腐历史语境下的“阶级话语”转变为法制式反腐历史语境下的“教育话语”、“公众话语”。廉政话语内涵的表层结构由与廉政语义直接相关或近相关的词汇聚合扩展到与之远相关的隐喻性词汇聚合，其深层的话语伦理则由结构观下的二元对立的“腐败”与“反腐败”式的主客体关系走向建构观下的官方话语与公众话语互文共现的主体间性的关系。十八大以来反腐新常态时期的廉政话语有力凸显了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激发了党员干部的主观能动性，展现了新时期共产党人治国理政和加强自身建设的政治智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处于不断发展中的开放性体系，反腐新常态时期国家廉政话语的构建，是当代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一环，也是丰富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应有之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制度创新的同时，廉政话语体系也随之不断调整与重构，通过人性化的表述以更加符合时代发展的需要，更加贴近人民群众的心声。

参考文献：

- 黄帅，2011，《改革开放以来中共中央对政治改革的路径选择——以〈人民日报〉词频研究为切入点》，《福建行政学院学报》第3期。
- 黄新根，2016，《着力构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机制研究》，《中共南昌市委党校学报》第3期。
- 黄传英，2015，《南宁市构建不想腐、不能腐、不敢腐有效机制的路径分析》，《中共南昌市委党校学报》第1期。
- 刘少杰，1999，《社会学的语言学转向》，《社会学研究》第4期。
- 刘旭凤，2014，《社会学角度的话语分析研究》，《学园》第13期。
- 李亚昕，2013，《话语的生产与消费——解读网络流行语体事件》，复旦大学学位论文。
- 钱力成，2010，《国家话语与公私关系：1950—2000》，《中国研究》Z1期。

- 费尔克拉夫, 诺曼, 2003, 《话语与社会变迁》, 殷晓蓉译, 北京: 华夏出版社。
- 人民日报, 2014, 《坚决惩治腐败, 严肃党纪党规》, 12月6日。
- 陶徽希, 2009, 《福柯“话语”概念之解码》, 《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2期。
- 王方杰、杨柳, 2014, 《谈心提醒 抓早抓小》, 《人民日报》4月2日。
- 王凤英, 2007, 《语义场理论和篇章研究》, 《外语与外语教学》第9期。
- 王珏、江南, 2014, 《推行权力清单 扎紧制度笼子》, 《人民日报》3月11日。
- 辛斌, 2008, 《语篇研究中的互文性分析》, 《外语与外语教学》第1期。
- 习近平, 2012, 《紧紧围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 , 2013, 《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 , 2014a, 《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六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人民日报》9月6日第2版。
- , 2014b, 《在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 , 2014c, 《在参加河南省兰考县委常委班子专题民主生活会时的讲话》,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 , 2014d, 《严格执法, 公正司法》,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 , 2014e, 《在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 袁迎春, 2015, 《阶级话语的变迁: 1950—2010》, 《天府新论》第6期。
- 优泽顺、陈建平, 2009, 《话语秩序与对外政策构建: 对〈政府工作报告〉的词汇变化分析》,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 第2期。
- Flowerdew, J. 2004, "Identity politics and Hong Kong's return to Chinese sovereignty: Analyzing the discourse of Hong Kong's first Chief Executive." *Discourse & society* 36 (9).
- Wilson, J. 1990, *Politically Speaking: The Pragmatic Analysis of Political Language*. Oxford: Basil Blackwell.

作者单位: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责任编辑: 刘海霞

economic problems in rural areas. This paper , based on a case study of Hengqu Village in Shanxi Province , intends to present a series of mechanisms of peasant cooperation in rural society. Through specific cooperative events like land adjustment , water irrigation and labor exchange ,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analysis of the leading and coordinating role of the village cadres in the cooperation.

Waiting in Line or Getting in by the back door: The Dynamic Process of Beds' Allocation in the State-run Aged Care Institution under the "High-subsidy and Low-price" Policy

..... Zhang Xiang & Wang Jiali & Zhang Haitong & Li Yang 162

Abstract: This is an empirical case study on the real allocation rule of beds in a state-run Aged Care Institution (ACI) under the "high-subsidy and low-price" policy. The price of state-run ACIs is regulated at a price lower than the full cost. The government provides not only the construction subsidy but also the operational subsidy to state-run ACIs. But we find in a case study on Chunhui ACI that over 77.5% of aged people successfully moved in after 2007 by the back door. Most of the occupants are not low income or disabled elder persons that need subsidy most ,but are in good economic condition or at a high social status.

SOCIAL STUDIES FOR MARXISM

Study on the Discourse Construction of Clean Government in Contemporary China: Text Analysis of the News of Constructing A Clean and Honest Government of People Daily' s Front Page since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Yu Qin 182

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texts of the news of constructing a clean and honest government of People Daily' s front page since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Through an interdisciplinary study , firstly , this paper researches and analyzes the discourse construction of clean Government in contemporary China. Secondly , it verifies the expanding process of the semantics of this discourse in contemporary China as the surface structure. Thirdly , it finds that the ethics of this discourse is a transition process from a dualistic relationship of the subject and the object to an inter-subjective relationship of the official discourse and the public one.

The Exploration of Regional Social Governance Model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 Taking Chen Yun' s Social Governance in the Northeast China in 1945 - 1949 as An Example Wang Xiaohui 195

Abstract: Regional social governance is an organic part of Marx' s theory of state. After the surrender